中國人如何再作中國人*

卡維波**

How Would Chinese Be (Alter-Native) Chinese Again?

by

Yin-Bin NING

在本期「超克分斷體制」的討論中，鄭鴻生的文章講此岸的台灣人如何再作中國人，本文則要講彼岸的大陸人如何再作中國人。我想先從一個大家都關心的問題開始，就是：「超克分斷體制」的提法是否預設了兩岸終極統一？

「分斷」的對立面無疑是「統一」，但是超克的歷史腳步並不駐足停留在否定對立面，超克不是歷史的大輪迴循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為超克不等於簡單否定，不是用「統一」來否定「分斷」而已，因為這個「統一」也同樣是當前「分斷」的歷史產物，在超克當前「分斷」的歷史過程中，（作為當前「分斷」之對立面的）這個「統一」也會一併地被否定，這才是真正的超克。超克的結果會帶著一些「分斷」的歷史痕跡，因此不可能就等於「統一」。總之，超克分斷體制並不是以兩岸政治統一為依歸的，沒有這麼簡單。

換一個問法：超克分斷體制之後，台灣有沒有可能獨立？或者會不會統一？我的答案是：現在所理解的統一和獨立是分斷體制下的統獨，這種統獨會隨著分斷體制一起走入歷史，現在的歷史指涉點改變後，所謂統獨都變了樣。如果未來獨派是含淚忍痛地被中國強迫宣告獨立，那當然不能等同於目前的獨派（故而1895年台灣民主國的「獨派」也不等同於目前獨派）。執著於目前統獨的人可能不會滿意我的答案；其實這些眼中只有傳統國家主權的人與其心態，就正是當前分斷體制的產物，需要被超克。

對我而言，超克分斷體制（正如何春蕤主持稿講的）首要是一個情感的事業，是要兩岸人民以及台灣的藍綠群眾從仇恨、猜忌、敵意、恐懼、嫉妒、優越感等等走出來，這些是分斷體制所培養或建構的**戰爭感情**，曾經普遍存在於兩韓、兩德、以及美蘇兩大陣營中。

* 這篇文章是和瞿宛文、鄭鴻生、陳光興、陳宜中與趙剛對於「超克分斷體制」的熱烈討論中誕生的。當然，文中的觀點只能代表我自己而非他人。

**服務單位：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通訊地址：320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 號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Email: karlweb2002@yahoo.com.tw

超克分斷體制的情感事業有很多可能做法，其中之一則是不把兩岸人民的差異操作為敵意，而是把兩岸人民的現在與過去之共同點轉化成善意的基礎或機會。這些共同點或者基礎，除了經濟方面外，在我看來主要是文化的和歷史的，有時候可以濃縮地用「中國人」這樣的語詞來表達——兩岸人民都是中國人。

（「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是台灣人」等等，一方面，可能是國族政治的排他召喚，因而讓外國人、外來移民、少數民族、抗拒國族政治者等被強迫同化或排斥在外。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都是中國人／台灣人」這類話語還可能是為了終止族群分裂、仇恨或敵意。如何促進後者而抗拒前者，也是本文的主題之一。）

在近代打造民族國家之前，「中國人」這樣的詞語曾被普遍使用嗎？「中國」呢？胡阿祥與宋艷梅在《中國國號的故事》講到「中國」名號在先秦時即已存在，但是這個「中國」名號所指的地域是多變的，可是一直擴大中（如從指著「天子首都」擴大到「諸夏之國」、「地處中原之國」等等），而「中國」名號所代表的文化原來是模糊的，但也是一直在加強其與遊牧民族文化的區分（夷夏之辨）。胡阿祥等認為秦漢統一後，「中國」就成為通用的名號，而且經常被用來指稱漢族建立的國家或皇朝法統，但是非漢族建立的國家也往往自稱中國，這些都是地域與文化概念的中國（頁 240-254）。我相信，古人逐漸地發展出一個歷史傳承與文化傳統的中國觀念，超越了朝代更迭的政權；或者說，不同朝代政權在中土的興亡替代，也會促成這個歷史文化的中國觀念的產生。但是這個歷史文化中國的範圍與確切所指，我認為是有待爭議的。至於政治概念的中國（即作為國家代名詞使用的中國），胡阿祥等認為是從明朝開始；到了晚清，中國作為國家的概念已經明確（頁 256）。

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催生了近代國族國家的打造，現代政治意義的「中國」和「中國人」隨著民族主義的進展而成為普遍的語詞。不過更重要的，我認為在這個政治化中國與中國人的過程中，文化與歷史的中國或中國人也因而被同時明確化，不再是個模糊的存在。這個過程值得簡略說明一下。

現代政治意義的「中國」和「中國人」是在建構自身為現代產物中誕生的，而這個現代性的建構不得不同時建構出一個對立的「傳統中國與中國人」，後者這個建構使得歷史文化觀念的中國變得更明確，但卻也將之納入政治服務的功能。

主流的或現代化派的中國民族主義，把歷史與文化的中國建構為現代中國的阻礙、建構為「傳統」，藉此建構出現代政治中國的觀念。弔詭的說，「去中國化」是早期現代政治中國的國族打造中重要的手段。在傳統與現代的對比下，五四運動——被稱為愛國運動——愛的是政治中國，而不是歷史與文化的中國。傳統中國被激烈的批判；我們看到對儒家禮教批判、反封建、漢字拉丁化或者全盤西化論、文明化過程等等。這些激烈的現代中國派當然不是沒有遭遇反對的聲音，從清末就開始有中體西用或更守舊的觀點，但是這一百多年來激烈的現代中國派基本上是主流，因為它最終和一個政治事業連結在一起，和國家主權、政治權力、政權連結在一起；傳統中國則扮演著輔佐或阻礙中國現代化的角色。

這也就是說，歷史文化觀念的中國，不論是否被當作應該被揚棄的傳統，還

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文化資源，都服務於政治中國的需要，而不是獨立於政治中國的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抵禦外侮等等目標。

總之，原本歷史文化的中國與中國人是實際存在的，但並不是高度反思的存在，所以沒有明確與普及的語詞指稱。可是在打造政治中國與中國人的近代民族主義過程中，歷史文化的中國與中國人被明確化了，但同時卻被納入「傳統 vs. 現代」的框架中，而實際上往往成為政治中國的工具。

從上面的觀點來論，即使像「中華民族」這樣的語詞也有了兩種意義：首先，「中華民族」當然是在現代民族主義打造政治中國之過程中產生的，過去並沒有這樣的名詞（「中華民族」來自於被打扮成「社會科學」的西方民族主義話語）。但是由於打造政治中國的需要，既要突出這個民族自古有之的歷史目的論，也要突出傳統與現代的斷裂，因而使得「中華民族」不但被回溯到歷史的過去，而且經歷著古老（傳統）與新生（現代）的蛻變，其意義便和「中國人」等同了。這樣一來，所謂「中華民族」也變成有了個新瓶裝舊酒的意思，就是除了指稱現代的國族外，也可以指稱歷史文化的中國人。故而，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既有政治的意義，也有歷史文化的指稱。事實上，這也是普通人對這些詞的理解方式。（有人聽到「中華民族的幾千年云云」就大呼歷史錯置，其實「中華民族」的一般用法和「中國人」、甚至「華人」一樣，往往是很鬆散的意義，並沒有什麼錯誤。***）

如果我們觀察近代政權（不論是民國或者中共）使用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這些話語的策略，我們會發現他們經常喚起歷史文化的中國觀念，然後導向愛國主義，也就是政治中國的目標。這個做法不但造成了中國／中國人話語的單薄化、正典化，而且也造成那些不認同現實政治中國，但是想認同歷史文化中國者的困難。

在做了上述的釐清後，現在我可以逐步進入文章的主題。我認為超克分斷體制的一個做法是從政治中國的民族主義事業中重新要回（reclaim）歷史文化的中國／中國人話語，但是這不是回到傳統中國，也不是簡單孤立出一個歷史文化的中國。這個重新要回的過程，必須是對目前歷史文化中國被政治中國所支配的超克，必須和民族主義或近代國民國家觀念與實踐做鬥爭。所以超克分斷體制不是個民族國家的統一事業。

不過，和民族主義做鬥爭可能變成空話，而且對於台灣人來說，和政治中國的民族主義做鬥爭，是否太遙遠？所以有些台灣人會想還是退回台灣自保，或者用台灣民族主義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

我的政治判斷是：不論退守台灣自保或搞台灣民族主義都不是活路，只是繼

*** 2010年4月註：本文發表後，我才讀到葛兆光〈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還是在歷史中理解民族國家？〉（原載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43期2005年10月31日）。關於以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範式（建立在西方民族國家的歷史建構軌跡）來質疑清末或民國以前「中國」的存在（或者聲稱「清末或民國以前的『中華民族』之提法不符合現代社會科學」），葛兆光此文有很好與重要的討論。

續鞏固分斷體制，對兩岸的和平不利，也對兩岸人民的反各類支配之運動不利。在我看來，台灣人在超克分斷體制上，必須重新要回中國人這個說法，這個中國人當然不是政治中國，而是以歷史文化中國為立足點，對政治中國的超克。鄭鴻生的台灣人如何再作中國人，大概也是這樣的思考。

台灣人以中國人或中華民族之名，來進行兩岸和解，並且支援和介入大陸人民的事務，有很多現實的益處，這裡不多論。最起碼，這會是超克分斷體制的情感事業，化解兩岸的敵意。然而這並不是政治中國的統一，因為即使就台獨而言，為什麼台獨不能和大陸有個歷史文化中國的共同處？為什麼需要刻意切斷歷史文化聯繫？為什麼要重演近代中國的去中國化戲碼？也許台獨害怕和對岸的任何歷史文化共同點（當然也有相異點）都會動搖台獨的信心？此外，台獨也有仇恨中國的感情，而使台獨無法自稱中國人。可是為什麼台獨一定要建立在仇恨政治之上？難道是台獨的決心意志不足，需要仇恨來強化？但是我認為台獨的仇恨政治與切斷歷史文化中國的聯繫，都是有很多後遺症的策略，尤其不利於台灣內部的團結，畢竟對外部敵人的仇恨，永遠會反射到內部來尋找敵人的代理；而且這些策略並不能促進兩岸的社運連結。

其實台獨自稱中國人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對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顛覆和突破，打破政治中國對「中國」的獨佔解釋。在我看來真正可行的台獨只有兩種，一個是美日台獨，就是依靠美國日本這些國家而獨立的台獨，另一個則是中華台獨，就是爭取大陸人民（而非中共國家）支持的台獨。關於這一點，我曾寫過一篇〈中華台獨〉的短文，放在後面當附錄，供大家參考，這裡就不多論了。

不過一些「歷史文化中國」的話語由於受到「傳統 vs. 現代」的影響而變得狹隘，特別是，傳統的某些面向被當作歷史文化中國的本質或代表，諸如社會主義與同性戀則都被排斥為「不合國情」或「外來非中國的」。針對這種保守話語，我們在超克分斷體制的努力中，應該重新設想歷史文化中國。

我們要主張：歷史文化的中國不是靜態的或只存在於古老過去，也不只是帝王將相、主流傳統的中國，而是從過去一直持續到今天，既存在於經典正統，也體現在旁門左道或小傳統與庶民生活中；歷史文化中國並不是封閉的系統——既有外來文化的影響，也在不斷重新建構的過程中。在大陸政權改革開放後，兩岸分斷體制有些新的鬆動，例如台灣的流行音樂與演藝文化進入大陸，形成兩岸民間與年輕一代的共同記憶。雖然台灣方面一直採取某種有形無形的封鎖策略，使得台灣人並不熱衷於接觸當代大陸文化，但是**這種準台獨的封鎖策略並未成功，因為它雖然阻斷了大陸文化進入台灣，但是卻無法阻斷台灣文化進入大陸**（香港的流行娛樂演藝文化也在之中扮演關鍵角色），以致於兩岸在庶民生活的某些層面開始增生許多共同記憶。1990年代全球化與西方流行文化更大幅度地同時滲透兩岸，以致於兩岸在流行文化層面的差異不是越來越大，反而是日益縮小。這個現象在我看來也是兩岸共同的「歷史文化中國」之一部份，也是超克分斷體制的一個基礎或機會；這個基礎或機會不一定是古老過去的正統主流、經典或儒家，反而是在現實生活中首先建立起來的共享之大眾流行文化。同樣的，改革開放後兩岸的經濟交往、社會交往與性交往（intercourse），都同樣地重新建構著兩岸共同的歷史文化中國。

要超克政治中國的民族主義，必須靠兩岸人民的一起努力。在此我要提出一個我稱為「複合社會」的運動目標。一般民族國家總是企圖同化其內部社會，理想上都要對應著單一社會，就是一套法律、一種制度；中國大陸為了統一曾經喊出一國兩制，還有人提議一國兩區、或一個聯邦下面兩個政治實體之類，但是這些安排不完全是我所謂的複合社會，因為這些安排基本上還是屬於分斷體制的形式，而且是為了政治的或統治者的利益而服務的國家社會形式。我所謂的「複合社會」重視台灣與中國社會各自內部的差異，這些差異與其鬥爭不能在國家政治安排下被置換或消音。我們知道，台灣社會內部有許多差異，因而有著社會運動的鬥爭，邊緣與主流的對立等等，同樣的，中國大陸內部也有許多差異，正在壓抑下逐漸冒泡興起。對於社會運動而言，其抗爭不是要被國家政治牽著鼻子走（例如台灣社運當然不是要服從台灣國家的利益，大陸社運也不是要為祖國統一目標而服務等等），而且還要開創新的政治治理形式來突破傳統的民族國家。

我所謂新的政治治理形式，就是複合社會。簡單的說，就是台灣內部也要實施兩制或兩法或兩區（「兩」可以被「多」取代），這其實已經是間接對「中國政治統一」或「台灣獨立（其實也就是台灣內部政治統一）」的一種顛覆，因為台灣本身都沒有統一了，那怎麼去搞兩岸政治統一呢？怎麼獨立建國呢？複合社會是從小的地方做起，像性工作特區、適用於不同價值取向人群的兩套法律等等，其精神是多元主義，是對國家主義（statism）的否定。複合社會的設計也要向大陸推動（如在大陸設置性工作特區），因為複合社會的特區或特法可以是跨兩岸的，由兩岸的社運來一起推動，互相強化與培力，像目前兩岸同志運動的互動就是很好的開端。對於未來兩岸的政治安排，則是爭取符合複合社會的國家形式（複合國家），這是超克分斷體制的一部份。關於複合社會的想法，我也寫過一篇短文〈複合社會〉，可供參考。

當然，要超克分斷體制更需要大陸人民的努力。這就觸及我題目所講的「中國人如何再作中國人」，前面那個中國人就是政治中國人，要如何再作一個不被政治中國所支配的（歷史文化的）中國人。

之所以講「再作」是因為畢竟歷史文化的中國人在先，而民族主義的政治中國人在後。不過這個「再作」不要只理解為回溯到過去，而應該理解為重新作中國人，作個不被政治中國所支配的中國人。

歷史文化觀念的中國人也有一個利於統治者的屬性，被政治中國所強化了。這就是丁乃非教授所講的，中國人本身是個階序觀念。有些人是正典的中國人，有些人則是資格可疑的中國人，或者不配作中國人等等。所謂「作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既是文化道德的，但卻也被政治中國所利用。事實上，許多歷史文化的中國元素在必要時可以被政治中國當作正面或反面的東西來利用。在目前的趨勢中，中國人的階序觀念就是中國人要那麼的文明、正向、陽光，集各種美德於一身。

照這樣說來，中國人要重新作中國人時，不是就回到現成主流的歷史文化中國而已，因為那個中國已經被政治中國所籠罩了。中國人民的歷史文化傳承或特

質，甚至當代流行文化都是被壓抑在一個政治的框架裡。雖然政治框架無法完全支配歷史文化中國的異質或雜質，但是如果不突破這樣的一種國族打造框架，那麼中國人也很難重新作中國人，無法超克分斷體制、打破民族國家的魔咒。

有幾個關鍵議題是國族政治的爭戰高地，是今後中國知識份子與社運可以努力突破的，一個是「毒品」的議題，也就是我稱為「放心藥」的議題。我以前曾說過，鴉片戰爭與吸食鴉片問題的相關話語是打造近代中華民族國家的重要建構，所以這個議題可能是最大的禁區。不過禁區總是主流與國家權力得以壯大的溫床，是「國家理性」（就是國家利益至上，可以不擇手段）的最好藉口。

另一個則是性的議題。其實中國在進入資本主義萌芽期時，性的書寫曾經在上層階級與市民中流通，那反映了歷史文化中國較寬容的性傳統。在打造政治中國的過程中，由於受到西方「性的現代化」的影響，對於性起初也不是完全禁慾主義的，而且早期還透過反封建的婚姻自由之議題來達成當時的性自由。不過，在目前總的來說，官方話語與主流上層基本上是禁慾的，但是容許一些「不道德」的性在暗中活動，只是受到嚴格的控制。不過最令人憂心的倒不是官方的態度，而是中國知識份子與社運對於性的態度——例如，認為性不是重要議題，或者性的社會運動不合國情或屬於下個發展階段。就連中國的女性主義者或婦運都還不能結合性運的議題時，中國其他可能的社會運動就更無法連結性運了。當這些社會運動無法連結污名的性時，雖然這些運動是為弱勢發聲，但是也因此繼續複製中國人的階序，也因而始終屬於主流（頂著正義的光環），很容易在新的治理形式下被收編。當然即使是性運動本身，如果也是強調自身的陽光健康與服膺主流道德，一樣有機會被主流政治收編到國族主義的事業中去，在多元文化主義下搖旗吶喊。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運動就是為弱勢服務的，所以為弱勢伸張正義的運動，並不是沒有可能變成另一種壓迫的力量。例如，美國女性主義法學家 Janet Halley 在 *Split Decisions* 一書就指出在美國，女性主義或婦女團體的治理其實已經深入街頭、教室、立法、政府等等，而且是個國際現象（頁 20-22）；我認為女性主義或婦女團體的（全球）治理幾乎都是在不被問責或究責的狀態下，而其治理結果有時會造成另一些壓迫，或者無法促進進步的力量。總之，大陸的各種社會運動要趕快去接近性運，互相培力，不斷向邊緣與非正典挺進，這樣才能突破國族主義的政治中國。邊緣性運動的存在是中國人重新作中國人的重要關鍵。

台灣過去在試圖突破台灣國族主義部署時，有過一些批判話語其實可以為大陸所借鏡，附錄二是關於「假台灣人」的一個摘要與短文，可以參考。從「假台灣人」的顛覆國族主義策略來說，中國人重新作中國人時，恐怕要先作假中國人。假中國人就是那些不夠格的中國人，可能是因為被當作性變態，或者是其他不符合正典中國人形象與規範的人，還有不符合國族的文明開化之自我形象，或者是一些不純正的中國人，這不只是說血統不純正，還有文化或其他方面的不純正。

一言以蔽之，作個假中國人的意思就是拒絕本質主義的中國人，因為在政治中國民族主義下，總是有某些歷史文化特質或政治特質被再現為中國人的本質（在通俗話語也常聽到中國人是善良、中庸、愛國等等），這些本質是階序化的「中國人」正典內容。故而，為了對抗這種民族主義的本質中國人，中國人必須

發掘自身的雜種性與串連各種異質性。不作堂堂正正中國人，而是作中國人渣。換句話說，當中國人認識到自己其實也不是那麼夠格、那麼正典、那麼純正，從而認識到自己或中國人原來是雜種（無法被再現為某種本質的純粹），就開始了對政治中國以及受其支配的歷史文化中國的超克。

結論是，當台灣人開始要作真中國人，大陸人開始要作假中國人時，對分斷體制下的國族主義之超克就開始了。

引用文獻

胡阿祥，宋艷梅。《中國國號的故事》，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甯應斌。〈複合社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1期，2008年9月，問題與討論，頁275-279。

Halley, Janet. *Split Decisions: How and Why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6.

附錄一

中華台獨——綠營的新出路

卡維波（原載於台灣《中國時報》2008年6月1日）

近來國民黨在促進兩岸和解的修辭從「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慢慢又轉進到「中華民族」，或許是希望最終能轉進到「大中華」這個框架。這對於堅持台獨的綠營是個新的挑戰，或許綠營應該開始考慮「中華台獨」來造成三贏的局面。

中華民族其實有兩個意思，也是可以各自表述的。一個是嚴格的學術意思，就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逐漸形成的命運共同體，並透過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器打造的現代國族，而國族主義就是主張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但是中華民族還有個主流的通俗意思，就是所謂的「華人」，主要是文化、地緣、血緣的指涉，而非政治國家的指涉。「華人」也俗稱「中國人」；但是綠營一直拒絕「中國人」的稱謂，宣稱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表面理由是台灣人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也就是把中國人的兩個意思（**Chinese People vs. Chinese Nationals**）混為一談；深層理由則還是和中國周邊的所有亞洲國家的去中國化傾向一致。

在兩岸對立的時代，台獨的成功要依靠美日支持的戰爭，以及全民的同仇敵愾。但是這要付出內部撕裂的代價，因為獨立的民氣依靠敵視對岸的中國人，仇恨政治在每日生活中要保持能量，則必須將外部敵人轉製為內部敵人，所以也在台灣境內尋找可仇視的敵人（中國人）。於是台灣就變成藍（中國人）綠（台灣人）廝殺的戰場。

如今兩岸和解的時代似乎已經開始，台獨的前景不能寄託在兩岸終又走向對立，而中共國家也不會自動放棄統一。故而我認為台獨未來要寄希望於大陸人民，以及與藍營民眾和解。這意味著綠營應該考慮「中華台獨」的新出路。

所謂中華台獨就是辜寬敏所說「中國與台灣乃是兄弟之邦」，然而不是等到台獨成功後才從敵國轉為兄弟之邦，而是現在就彼此相認為兄弟姊妹，承認台灣人是華人、中國人、中華民族的一員。這樣可以有效地化解大陸人民對於台獨的敵意與誤解，以（同胞）愛取代仇恨中國人，使台灣不再被視為外國威脅中國的跳板或棋子，而是與大陸永遠親善友好的兄弟之邦。畢竟，大陸人民並非都認可其政府政策，中華台獨很有可能爭取到大陸人民的同情，軟化中國國族主義，而使得中共的統一政策無法得到全民的支持。此外，中華台獨雖然堅持「終極獨立」，但是因為「中華」的立場，也還是有和中共政權對話的空間。

更有甚者，中華台獨也和國民黨的「中華台灣」有共同基礎，因為中華台灣原本就包含著中華台獨的選項可能。中華台獨也可能使得台灣人內部不再分裂。

在歷史上與現實中，非國族意義的中國人／中華民族／華人向來存在著不同國家。兩岸同屬中華民族、都是中國人，不表示不能夠一邊一國。中華台獨以和解共生、求同存異的精神，來迎接新的兩岸情勢，值得綠營人士慎重思考。

（附記：最近南韓對兩岸經貿合作的現象鑄造新詞 Chaiwan，就是 China 加 Taiwan，這個詞也是一個值得推廣的用語。海峽兩岸只有一個 Chaiwan，兩岸可以在一個 Chaiwan 的架構下共同發展，海峽兩岸人民都是 Chaiwanese。）

附錄二

A. <假台灣人專輯>摘要

卡維波（原載於《島嶼邊緣》1993年第八期〈假台灣人專輯〉，專輯網址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alter_native/index.htm）

「假台灣人」中的「台灣人」乃是指「台灣國族」。至於「假」，則主要是後殖民論述中像 Homi K. Bhabha 提出的 hybrid 觀念，此字有「雜種」、「雜交」、「摻雜」、「摻假」的意思。故而，「假台灣人」也就是摻雜或摻假台灣國族的意思。

「假台灣人」批判的對象之一則是近來台灣所流行的「新台灣人」論述，這個論述基本上說：透過台灣閩南、客家、外省及原住民四大族群的平等互動，而形成新台灣國族，不論閩南、外省或原住民，大家都是新台灣人。

「新台灣人」的論述因此揚棄了本質主義式的台灣人論述，而指向一個未來的、開放的、交互主體下互動形成的新台灣人。

「假台灣人」對上述「新台灣人」論述的批判，其實直指「國族」問題的中心，限於篇幅，不在此敘述。不過，在摻雜或摻假台灣國族的企圖下，這個專輯的一些文章指出，假台灣人是台灣的第五大族群，是台灣四大族群之外的一個新興族群，這個族群是國家機器在以四大族群來建立生命共同體此一國族同質化過

程中出現的渣滓（族群），是安公子（吸食安非他命者）、懶女人、低能、好色男女、流浪者、外勞、瘋漢狂婦、變態、「假」假台灣人、同性戀、共產黨、縱火者、新新新人類、崇拜媚外者、午夜牛郎、通姦者……等一切沒水準的、畸零的、異質的、偏差的、邊緣的人渣大軍，或雜種／雜碎生命共同體。在鉅型的國族敘事中，在各種充滿現代化迷思的國族寓言中，假台灣人雖然無法被代表或被呈現（represent），但是卻在國族營造或國族同質化的過程的旁邊，一天天地蔓延滋生、遊牧逃逸、戰鬥遊戲。《島嶼邊緣》的「假台灣人」專輯則是對此一事實的歡樂論述，也是站在台灣工農婦女學生殘障環保團體等弱勢人民立場，向霸權集團的主流論述說一次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政治挑釁與進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專輯中有數篇文章均附和了丘延亮的「國家—民族共犯論」，指出國族認同的建立即是國家機器的營造。這樣的提法勢必將對本土有關國族的討論帶來衝擊。

B. 從新台灣人到假台灣人

卡維波（原載於台灣《聯合報》1996年4月15日）

由於一句「新台灣人主義」，使得「新台灣人」再度成為新聞、耳語和學者討論的焦點。

「新台灣人」的說法其實由來已久，也曾被不同黨派、統獨立場互異的政治人物所倡導過，近幾年也被《新觀念》、《遠見》等雜誌大力鼓吹。「新台灣人」幾乎是舉國共識、沒有異議的霸權話語。

不過大約三年前，現已停刊的《島嶼邊緣》雜誌卻曾對當時流行的「新台灣人」說法加以批判，並且提出「假台灣人」的邊緣觀點。

這種邊緣觀點認為「新台灣人」說法僅僅建立在「族群」的基礎上，所以很容易被統治者僅僅等同為「四大族群的生命共同體」（這是當時李登輝對「新台灣人」的解釋）。更有甚者，「新台灣人」的族群政治在初期是強調「省籍平衡、多數統治」（所謂「政治權力應按照族群人口比例來分配」），在後期則強調外省人應對台灣認同；這樣的「新台灣人」說法並沒有把原住民（台灣最受壓迫的族群）放在族群政治的中心，因而統治者也很輕易地把「族群平等」運動收編成政治整合的過程；易言之，「族群平等」變成只是各族群的菁英進入統治階層的問題。像這樣的「新台灣人」說法是在為一種由上而下的民粹主義鋪路，強化了李登輝情結，並且會使建立在族群政治上的反對運動被收編。

如果「新台灣人」不僅僅只建立在「族群」之上，那麼就應該同時提出「（新）台灣是兩大性別（男女）／兩大階級（勞資）／殘障與體健／無殼蝸牛與土地財團／同性戀與異性戀…的生命共同體」，故而可以提出像「同性戀也是台灣人（也要活得尊嚴、快樂、希望）」、「同性戀與異性戀族群融和成為新台灣人」等等具體破除現有不等關係的主張。這樣的說法不但要求弱勢邊緣者的正義，也使「新台灣人」說法不易為統治者所收編。

如果「新台灣人」的族群政治以原住民為中心，那麼「族群平等」的內涵就不會只是各族群菁英的權力分贓，而可能會凸顯漢人外來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以及原住民所涉及的環保、階級、性別、資源分配、歷史記憶等問題。這些新的關注會促使人們對族群平等有更深刻的反省。

此外，主流的「新台灣人」說法還可能滑向國族（民族）主義，而國族主義毫無例外的會強化國家的統治，削弱民間自主的力量，壓迫邊緣弱勢的群體。

所謂「假台灣人」（alter-native Taiwanese）就是企圖改造上述「新台灣人」，但是保留其「族群平等」精神的提法。假台灣人宣稱她們是台灣的第五大族群，並且呼召被主流「新台灣人」排除在外的女人、殘障、外勞、貧民、無殼蝸牛、勞工、年齡弱勢、同性戀等情慾邊緣人，來認同假台灣人。假台灣人說：「我們也是（新）台灣人」，因此要求各種（包含假台灣人在內的）族群平等，要求族群正義。

「假台灣人」不接受現成的族群分類，因為：如果以血緣為族群分類的基礎，那麼平埔族的後代到哪裡去了？為什麼是「四大」族群？誰有權把原住民九族算同一族群？為何族群歸屬以父親（權）而非母親為根據？為什麼外省客家不和本省客家同一族群？等等。現成的族群分類其實只是統治者對人民的命名分類，「假台灣人」自稱是第五大族群就是要爭取人民的自我命名權。

「假台灣人」也不接受現有的族群建構故事，因為這類建構多只建立在簡單的「中國／台灣」二分，忽略了四十多年來蔣氏國民黨形式的台灣國族主義（以國語和國家機器把台灣統一成一個國家或共同體），以及在美國的經濟與文化殖民主義主導下的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怎樣消滅了台灣各族群的差異。許多第三世界的族群政治，其實正是起源於對這種族群同質化現象的反抗。

但是正由於族群差異的泯滅與同質化，以及各種國際與本地文化的雜交，台灣也出現了一些攙雜各族群特色、但又不具任何族群特色、或說無法按現有族群歸類的「雜種」畸零族群，她們也是假台灣人的社會學基礎。

其實，「假台灣人」的說法就是要把台灣人酷兒化（queering Taiwanese）、邊緣化、歪邪化、怪胎化，這樣的台灣人不會是個優勢／強勢／威嚴／正常／主流的支配者形象，不會想要進一步鞏固現有的宰制關係，因此才是真的「新」台灣人。

Cindy Patton 等人曾經擔心當代的批判言談常把「階級／性別／種族／年齡／情慾／殘障」等並列，因而在喚起一種公民權的想像，侷限在國族國家的論述內，因此也難逃國族政治的魔障。但是假台灣人的提法正好突破了這一點，可值得我們繼續發揮論述下去。